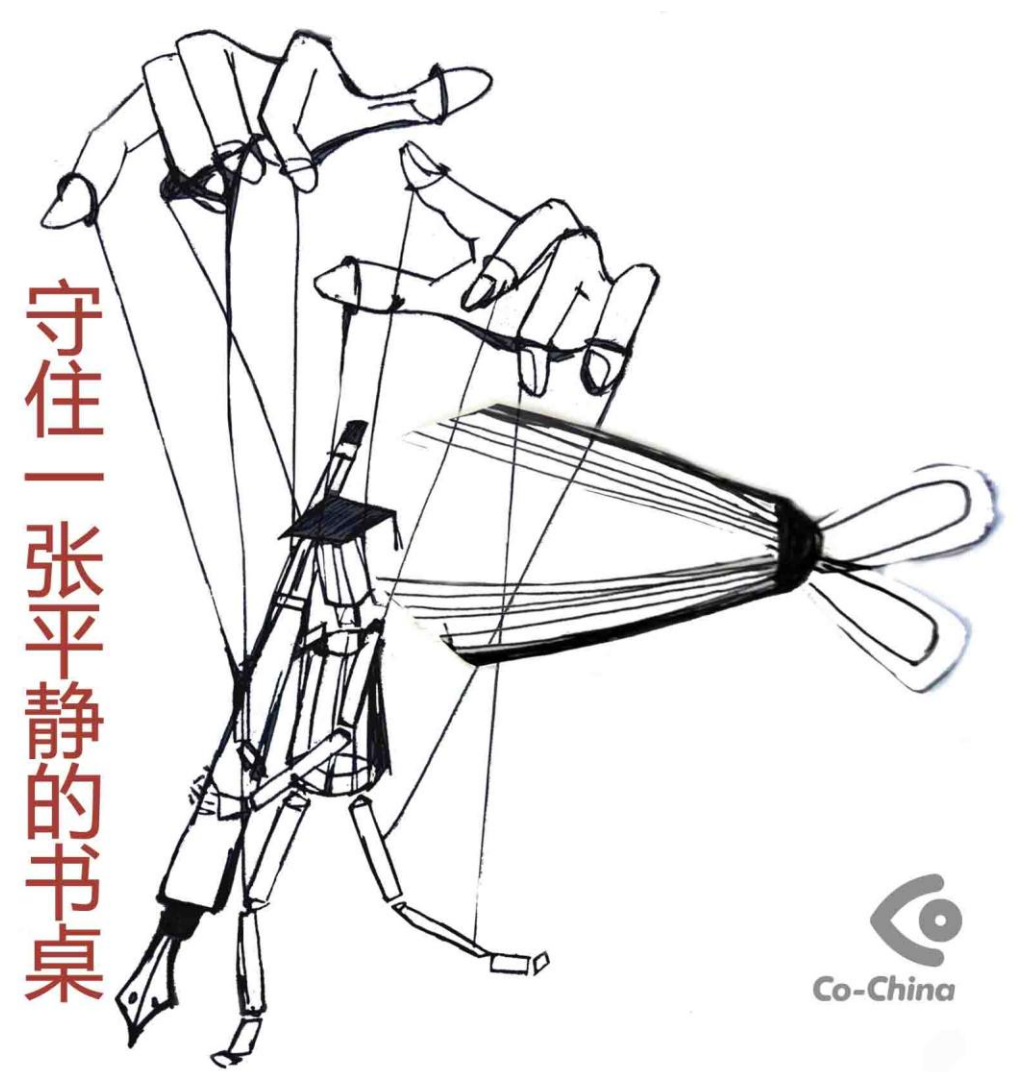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组织以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力图推动校园里“积极健康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促进社会的爱读书、爱思考的精神风气”。刚刚做了两期活动，正在积极筹备第三次之时，却意外接到西北政法校方的严辞通知：“1、读书会绝不能搞，所有教室、会议室、资料室都不许使用；2、通知相关老师不能参与；3、要求所有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



很难想象“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这样的要求出自一所大学的管理者。当然，西北政法大学校园里所发生的这一幕，其实并不陌生——此前，各地高校对学者讲座、专题研讨会、观影活动等说不的情形已经时有发生。

抗战时，北平学子面对步步紧逼的侵略者，曾经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今天的和平年代，这位西北政法副教授竟也只能在过道里站立着组织了他的第三次读书会。面对这样的情景，谌洪果老师深感痛惜：“为大学精神之沦丧而痛心，为社会缺乏理性宽容精神的暴戾风气而忧虑。……更愤怒于强权对于对于学生的自主活动和独立思考的蛮横压制。”

本期 1510 周刊从谌洪果老师和他的读书会切入，聚焦当代知识分子在大学这种公共空间中的角色与担当。开篇收录了谌洪果在读书会被封杀之后连续发出的两篇文章，它们除了详细介绍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更着重表明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作为一名以学术立业的知识分子，作者强调“如果不了解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趋势，如果不在面对‘愚陋不堪’的现实中提炼出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那做出来的学术一定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

陈向阳则在指出“精神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孕育了现代大学的独立气质”的同时，也看到中国大学中“长期的文化专制、思想高压以及学术研究的泛政治化，致使大学的包容气质和自由气质愈益消退，狭隘专横气质却愈益繁盛”。作家杨照从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回顾了当年在台湾的学校里所感受到的来自远方的“北大精神”，即自由、开放与包容，呼吁大学应该“培养青年学子不一样的视野，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黄慕春的文章深入解析了人文精神的内核，提出“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 在最后，本期周刊选用了崔卫平、金雁、贺卫方、郭于华和周有光先生等人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角色与担当的访谈，对身体力行坚守学术独立底线的人们，表达我们理应的敬意和支持。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陈】

7-1 谌洪果：关于读书会风波致我的学生



“风雨过后是彩虹，对生活总要有盼望。就让我们谨记韦伯的期待，做一个具有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的人。”

师门各位同学：

写这封可能有些直白的信，是想和你们坦诚廓清一些认识。关于这次读书会风波，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我理解你们的担忧，因为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但作为和我这么多年的学生，作为了解我的积极自我反思及追求生命长进之风格的朋友，我希望你们任何时候，都无需怀疑我对学术的纯粹坚守、无需怀疑我对每个个体人格独立尊严的捍卫。这是我的一贯风格，也是我每次无奈抗争的唯一动机。也是基于这一坚守，我才为大学精神之沦丧而痛心，为社会缺乏理性宽容精神的暴戾风气而忧虑。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坚守，我从来反对一切以别人（尤其是以学生）为手段的做法，更愤怒于强权对于对于学生的自主活动和独立思考的蛮横压制。

然而，作为学生，你们必须知道，哪些事情是原则问题，不容妥协。你们也有必要知道，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值得坚守的，尽管这种坚守会付出一些代价。但出于自主自愿的选择判断，出于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出于守护正义和良知的坦荡胸怀，压制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成熟，许多恐惧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刚才，我在人人网上看到了荣静的回复，得知你们私下的商谈和永亮等的建议，比如读书会能否改到校外 AA 制之类，但这事我早在微博上已有公开回应，姑且摘录如下：“很多朋友



主动为读书沙龙提供校外地点，我非常感动和感谢，但只能婉拒了，希望能够理解。读书沙龙的初衷和原则，就是大学内的正常师生学术交流活动。我之所以敢全程公开，欢迎各界参与，也是内心没鬼，单纯为营造积极健康、爱读书思考的社会风气。我坚持在校园举行不退缩，这是大学老师的权利和底线。”你们也清楚，这学期读书会的初衷，原本就从未打算在大学校园外进行，读书活动虽有推动公共理性和公民教育并扩大影响的想法，但参与主体就是学生，我的定位也从来都是以学术为本的。更何况，在此事目前受到极大关注、甚至有人动辄想往政治上靠的情况下，我们更不可能把读书会放在校外进行，否则性质就完全变了。我不怕别人的污名化，但我害怕自己做事违背学术自由的伦理。

不过我还是想对读书沙龙以及我的学术坚守再多说两句。其实，衡量一个活动是否遵循学术原则，就看我们围绕书本的讨论，是不是在自我启蒙自我教育的同时，也坚持基本的学术的话语和传统，并且坚持平等自由的批判和交流。对此我一向问心无愧，并且从讨论的学术深度而言，每次读书会都在进步。想想我们以前读《约伯记》、读《论语》，读不同的书，不也常常充满争论？那时的学术含量显然比不上今天。

当然，除了这种读书活动本身外，关于对学术自由的维护，还有更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想想当年四川灾区调研回来，怀着善良愿望想做个汇报会，都遇到巨大拦阻。想想我这些年请学者做公开报告受到的那些巨大压力，所以，我们在自我省察的同时，在怀疑是不是坚守学术的同时，为什么又不能稍加思考和面对，真正想扰乱学术风气的，真正反对学术、压制思想的，真正想在纯正学术中掺杂各种私利和政治杂质的，到底是谁？难道是我们自己？

我不知道说了这么多，你们是否理解。在今天的中国，作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从来不是风花雪月和自娱自乐。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共关怀，如果不了解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趋势，如果不在面对“愚陋不堪”的现实中提炼出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那做出来的学术一定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尽管师门大部门同学今后不会以学术为业，但我希望你们能清楚学术到底是什么，学术的意义何在，你们也要理解在中国，只要你想真正做些有益社会的事，就一定会有阻力，但不能因为有阻力，就不去身体力行拓宽自由的边界。这是我作为学者和公民的本分所在。



一切以学生为重。我也早已在微博声明，学生作为成熟公民，自己想清楚再参与下午的读书会。我没有权利替你们做出决定，我没有权利鼓动你们，也没有权利拒绝你们。不过，我说过了，如果有谁因为此事给自愿参与的学生使阴招、穿小鞋，我将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批判和反击。一个人行得正，心中有光明，还担心什么？

这些年，为了国家和社会，为了大学精神，为了学术底线，我身体力行做过一些具有公共性的努力，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学者和教师的基本责任感所在。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不有所呼吁和行动，哪还有什么大学？让一批批学生的青春四年被奴化的教育摧残，是不是最为伤天害理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必须再度表明，我无意于追逐名利，不热衷政治，更不喜做官掌权。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副教授，普通的公民，一辈子如此。在观察社会、对抗不公、艰难付出的过程中，我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我平生最大愿望也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回到书斋，回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考高度那里，做出无愧良心的学术探索，留下一两本拿得出手的学术著作。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们应该了解我，我对现实政治其实并不关心，我更关心这个民族如何在理性宽容和爱的基础上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但是，比关心民族未来更重要的，我更大的关心则是根本的人性，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个体的幸福。所以，在现实中，我希望你们都像路德说的，做好日常的工，珍惜并善加经营自己的幸福，关爱你身边的人。最终的最终，我的国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我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短暂如浮云般的、寄居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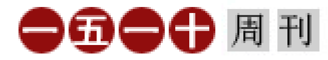
下午就要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了，我坦然面对各种突发的情况和压力。风雨过后是彩虹，对生活总要有盼望。就让我们谨记韦伯的期待，做一个具有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的人。我感恩你们一路的陪伴，愧疚于你们为我的各种担忧和付出。我没有别的能量，可以让你们更有钱，更有好的工作，更有地位，但我爱你们。

洪果在下午读书会前，匆匆。

2012 年 11 月 24 日周六上午

此信致（因时间紧，名字可能有所遗漏，请见谅）：





黄兴超、陈洁、申文、吴翔、沙尘兴嘉、荣静、陆晓昱、宋泓宜、刘熊擎天、岳媛、高鹏、田翠、尚剑、米粒、韩辰子、张琳琳、周英、肖惠娜、宋健、王小伟、王永亮、杨扬、赵晓阳、刘少杰、于鹏、陈金鼎、赵睿光、曹皖、田晨、吴龙珍、崔映西、万旭、李增强、邓龙阔

（谌洪果，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e6c4101017pu9.html。）

【返回目录】



7-2 谌洪果：大学读书会被禁事件中的学术与政治



“我知道我对这些立场的重申，不会取得什么现实的效果，但我相信它们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事关中国大学教育生死存亡的底线和原则。”

自 11 月 10 日起，我个人发起了大学校园内的读书沙龙活动，参与主体是我带的研究生和自愿参加的本科生。初定本学期一共只搞四期，连续四个周六进行，分别阅读穆勒的《论自由》、达尔的《论民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考虑到这种积极健康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的爱读书、爱思考的精神风气，所以决定每期皆在网上公开时间地点及讨论过程，并欢迎西安其他高校的学生及有兴趣的人士旁听交流。适逢西北政法大学官方也在举办“读书文化节”，心想这真是相得益彰、和谐互促的大好事。

第一期、第二期皆顺利举行，讨论的内容尽管由于时间所限和带有普及性质，还不够深入，但始终确保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性。到第三期海报提前网上公布后，读书会横遭禁止。11 月 22 日（周四）上午 10 点多，我向传达禁令的院领导坦承了读书会的初衷、原则、方式，并表示：理解校方的压力和做法，但我非常希望能告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读书会不能进行。虽然我坚持教师学生在大学里有着以各种形式读书的基本权利，但内心已决定妥协。

没料到下午两点多我刚到办公室，便接到校方的另一个通知。原来在上午我真诚陈述完意见并天真等待回应的过程中，校方紧急召开了职能部门会议并作出如下决定：1、读书会绝不能搞，所有教室、会议室、资料室都不许使用；2、通知相关老师不能参与；3、要求所有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



这三个决定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触犯了我无法容忍的基本的学术自由独立的底线。西北政法大学，你这是怎么了？一所堂堂的大学，听命于不公正的指示倒还罢了，怎能如此变本加厉，完全无视大学的基本功能和使命？我认为，校方的这三个决定是无理、傲慢和蛮横的。其潜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听你的解释，也不必向你说明禁止的理由，只要是上面禁令的，就坚决不让举行。大学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似乎就是只唯上，不唯学。那你们平日口口声声的以学生教师为本、教学学术至上到哪里去了？是的，你们有压力，但有压力难道就是彻底顺从的理由？你们的责任伦理到底是作为学术守护者还是政治驯服者？我为自己所爱、所工作的这所大学的如此荒唐决定感到痛心，当晚，我焦虑并彻夜难眠。

但我从头到尾都坚持着理性和尊重校方的做法。尽管此时已经对读书会的举行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想平和地与校方多做些沟通。从当晚到第二天（周五），我以短信、电话、面谈等方式，与从学校到学院的五六位领导都进行了联系，尽管他们要么没接电话、要么含混几句，要么安慰说确实没办法，上面的任务，但他们对我的态度都是友善的。然而，他们都在回避着关键的问题：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没有我错的理由，那为什么要禁止一场单纯的教学学术性的读书活动？

很多人说，这种事情禁了就说明人家认为你有问题，你还询问理由，不是迂腐吗？是的，我承认我很迂腐。但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点基本尊严、不被粗暴对待的和谐社会，询问理由就非常重要。然而我必须尽量从理解校方、理解上面的命令者的角度出发，多方面做出有利于稳定的努力。正好院里有领导给我善意的建议：让我按照学校有关举办研讨会讲座的规定，以正规程序填写申请表，然后由校方尽量跟上面沟通，这样把读书活动完全纳入可控制的小范围内，让学校有交代，让上面也放心。我想这的确是化解问题的好办法（尽管我并不认为读书活动属于研讨会范畴，并且也认为学校研讨会讲座须经审查的规定完全是不合理的），于是便积极配合，抓紧写申请，并附带了说明：如果觉得读书沙龙的名称“公民自治合作”有问题，就去掉这个名称；如果认为读的书、讨论的方式有问题，就进行调整。

申请提交上去，下午得到的回应是申请主体不适格，不予批准。至此我已做了所有该做的努力，加之在这期间得知读书会准备发言的学生已被校方谈话和警告，校内所有可能读书的场



所的管理者也都接到了严禁使用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再继续退让，那我就是愧对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就是彻底放弃我基本的做人的原则。于是，半个小时后，我正式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条消息："为捍卫学校内读书的原则，守护大学自由独立精神之底线，我决定本周六的读书沙龙活动继续在政法举行，时间不变，地点是我的办公室，行政楼 228 房间。我抗议校方对学术教学活动的压制，尤其是抗议校方威胁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的做法。但为保护学生，请各位自愿参与的同学作为成熟公民，千万想清楚再来。"

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在经历了各种巨大压力、我的心里也饱受煎熬的情形下，在做好最坏的打算之后（比如被人搅局、读完后我被带走），第三期读书沙龙终于正式举行。我的办公室狭小简陋，被书堆满，挤站着最多也就容纳十人，没想到自发来了五十人左右，基本学生占一半，西安热爱思想文化的人士占一半。当然，来的人中也包括几个心不在焉的面孔。我都无比感谢和欢迎。鉴于人多，读书会只好临时放在了旁边的楼道进行。好在这是周末，没人上班。两个小时的读书会，大家和缓地交流读书心得，尽量控制掌声，保持楼道通畅，维护环境整洁，自觉做守法的好公民。读书会最后的总结中，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我们今天终于站着把书给读了。我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也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但，我是人，我不能没有一点人的坚守。我又没有反党反政府，所以很困惑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我拙于表达各种感谢，只知道我亏欠了太多太多关爱我的人，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亏欠校内提供各种帮助和默默支持声援的许多教师同事，我不愿让我的朋友们因为我个人的活动而担上莫名的风险。我尤其是亏欠了我的家人。因为这件事，我让夫人担心受怕，自己没有在周末陪伴儿子。直到今天下午，我才专门陪夫人孩子去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学生，因为这件事，让他（她）们跟着受累、受无辜威胁，尤其是两位刚成为我的研究生的小女孩。本来是跟学生读书交流，促进她们学习上进的好事，却成为她们精神的负重。好在周二晚师门将有场吃饭聚会，我会好好拥抱你们（请狄马同志不要吃醋）。

对于那些阻拦这次读书会的诸公们，我要说，你们力量强大，我在你们面前就是孤独的个体，简直不堪一击，但我发自内心对你们毫无抱怨，我真的理解你们的职责、顾虑和敏感，但



既然这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我想我有必要借助这次读书会的主题“学术与政治”，来就我的读书活动中可能被你们认为是敏感的、被政治化的地方，一一做些申辩，希望你们能耐心倾听：

——关于读书沙龙的名称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就是因为名称不对才遭禁的。是的，我从不讳言读书沙龙的名称是“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许多人说你搞读书活动就是了，为什么非要起这个敏感的名字。敏感吗？难道为自己的学术活动叫上一个符合自己关怀和理念的名称都不行？况且，我在第一次读书沙龙上就已对这一名称有明确解释（可见网上视频）。这只是我有感于西安 9.15 事件中打砸抢等暴力行为对和谐社会的破坏，只是基于我对这个民族动辄付出流血代价的忧虑，而倡导的一个主题性的活动名称。其主要内容就是主持些读书会和请些人来讲座，通过这样的公民自我教育，来传播理性、宽容和爱的公民精神。所谓自治，无非是强调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人格独立、心智健全等；所谓合作，无非是弘扬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公共关怀、理性交流、团队合作精神等，难道这些不利于稳定和谐？这种没章程、没组织、就我一人单干的活动主题，与组织党派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人会直觉地认为公民、自治、合作等词有阴谋化政治化之嫌，尽管我对此在诸多场合都已有明确交代，你们非要不信，非要那样理解，我实在也没办法。无论我绞尽脑汁安什么样的名称，在有些人的眼光中都会变得异样，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在一个名称是否敏感上浪费时间。我今后仍会继续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我开展公民教育等学术性活动的主旨。即便我放弃某个理念，也绝不是因为这个理念是敏感的，而只是因为这一理念是不正确的。

——关于读书会本身的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本身就是遭禁的理由。许多人说，你课堂上教教书、搞搞自己研究就行了，没事搞什么劳神的读书会干嘛？要知道，当年什么什么革命党就是靠这发家的。说实话，我带着学生或帮助学生开展读书活动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还从来没把读书会的内涵往这方面想过。1990 年代中期，北大李猛、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组织的读书小组，对他们自身教益颇大，对我们这些后进的青年学生也影响深远，他们那批人业已成为今天中国法学的中坚力量。难怪赵晓力曾说读书会是“无形的学院”。在那之后直至今天，中国各个大学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早是多得不计其数，成为大学一道美丽的风景，这么多教师学生都在组织读书会，到底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还是为了闹革命，玩政治？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科学的著述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公共阅读和讨论，本来就是至为必要的，而且，今天的大



学，早就不能局限于课堂上的讲授，更重要的学习就是这些读书活动、论坛沙龙、网络交流、社团锻炼等。连读书会都被政治化了，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关于读书会的公开与秘密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被禁就是因为你太公开。许多人说，反正都是读书嘛，私下或秘密进行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大张旗鼓？我再次感到不解。怕搞阴谋所以不行，活动全程公开也不行，这叫人怎么办才好？我的回应很明确，首先，我又不是搞地下党，非要故作神秘干什么？其次，不对外公开的别的私密形式的读书会，我也参与过不少，比如我和学生以前更常见的读书方式是不超过十人，一学期只精读一本书。但那能说明什么？说明我搞另外的公开的、人数更多点的读书形式就是错误的？作为教学教育实践的尝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积极探索那种公开化的、带有普及性质的读书活动？比如我的这种读书会，就是试图在小范围精读之外，精心选择四本不到两百页的大师经典，分别涉及对自由、民主、学术、政治、革命等基本概念的正本清源的学术辨析，可以一周讨论一本，正好非常适合所设定的公民教育的主题，怎么不行？我公开读书会的安排和内容，甚至欢迎相关部门的人来观摩，不正说明我没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就只能允许某种单一的读书形式存在？难道你们心目中认为政治正确的那种单一适当的读书会形式，不也是从无到有探索出来的结果？

——关于跨校读书会的问题：有人推测：你的读书会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你不只在政法本校进行，还跑到西安外国语大学进行，这种跨校横向联合，当然会触犯当局的神经。我对这样的看法只能哭笑不得。第一期读书会本就是在政法举行，每次读书会的书目、主题发言人选、议程的确定，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在安排，从来没有过和谁联合的问题。只不过因为第一次读书效果很好，温厚好学前来参与的西外王天定老师见这种尝试很有意义，值得让外院的学生有所感受，活跃一下那边的学术氛围，所以便建议第二期放在那边举行。过程就这么简单，连这也被视为有政治敏感性，你让我还能说什么？幸好我一开初规划读书活动时，就从未想过要到大学校园外阅读。虽然我追求有更多人的关注，想要把读书这种正能量辐射至社会，为社会和谐带来积极影响，但每次读书主角仍然是几位学生和一两名教师，其余基本就是参与旁听者，实质仍然是以此作为大学教学活动的一个适当补充。要是我当初把读书放在校外，说不定早被安上了什么罪名。我不把读书活动安排在校外，就是因为我是在做教师的本分，这在我看来就

是最正常不过的学习活动。我听闻有人甚至因此发挥联想说你这次在本校，下次到外院，再下次不就可能会到广场去阅读？我想说，这种无节制的主观推断，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阴谋论思维。

——关于读书会内容的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被禁，是因为读的书有问题，你们要组织读十八大报告就好了。对此看法我倒马上能找到反例，多年前就有人因组织读 82 宪法被禁止的例子，这又怎么解释？出于学术性的宗旨，我绝不可能组织学生读报告或政治文件的，甚至我一直给学生的建议都是办读书会最好别读当代国内的著作，要读就读一流的经典，越古典越好，这是学术和眼光的训练过程，不要匆忙想着读书要解决哪个现实问题。许多人说，你看，你列的这几本书名有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等词，这还不敏感，吓死人啦。可是，这些书都是国内公开出版的学术经典呢，觉得这些词敏感？你试试把这些词统统去掉（包括去掉前述的公民、自治等词），看看我们的宪法将会七零八落、残缺不全到什么地步。况且，我每次都在强调，我们的讨论完全局限于学术概念、传统及源流的理清辨析。若敏感到这份上，这世上还有什么书可读？

——关于参与人的数量的问题：有人猜测：一个读书会居然有四五十人，这就是被禁的理由。这些人数真的是不稳定因素吗？要知道参与读书的主体始终是学生，自愿前来的社会人士也都是抱着求知和思想交流的心情来的；我甚至在海报中皆要求参与者最好都通读我们要读的书目，以便讨论的主题更集中更具学术含量。你真要说敏感，三人以上就足以成立支部呢，是不是所有三人以上聚会都取消？重要的是看我们聚在一起是在干什么，大家通过读书，变得更理性、更成熟，更阳光，更充实，能说这些人会破坏社会稳定？的确，我内心也认为读书会四五十人规模还是多了些，但我的这一考虑完全是从学术讨论的充分有效角度出发的，同样根本无关于政治。何况我们读书的过程平等交流，思想争论，不骂人不打架，不抱团不发宣言，完全遵守校内读书场所的一切文明规定，难道还值得风声鹤唳地予以禁止？

——关于读书策略的问题：有人猜测：你要能再有策略一点，读书会不就顺利进行下去吗？是的，以上概括了那么多的关于关于，这些“关于”归结到一点，即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个苟且的思维，那就是你如果做什么事，要多讲策略关系技巧（原则呢？），只要能把事办成，怎么怎么灵活些都行。我想声明，我不是玩政治，也不是做交易，不过是在读书，不过是在坚守



学术自由的底线，我何必讲什么策略？如果说我讲什么策略，那我的策略就是始终把人当目的而不是手段，我的策略就是面对莫名的压力，仍然尽可能秉持宽容、忍让、善意、尊重、理性、阳光、健康的心态进行沟通交流。我的策略就是我的目标和做人的姿态。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简单化，而不是以策略为名不断揣摩公权的心思意念，而忘了该时时拷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做着无愧良知和使命的正确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思维、斗争思维和政治思维，使得太多人一方面对政治公共生活报以极度冷漠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整天都生活在政治化的疑神疑鬼当中。长此下去，我们的制度文明始终无法上一个台阶，我们的民族也就始终无法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

请原谅我如此冗长的申辩。我已经无路可退。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为了一个读书活动的自由，居然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我无言以对。我没有悲壮感，只是感觉凄凉。我知道我这次抗争的后果，只会使我在这所大学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今后想要做任何事情，甚至正常的教学工作，都可能被更加重点照顾地选择性执法，会继续受到百般刁难。我知道后果，但我必须做，我自己承担，这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不听命于政治，但我听从于内心的呼召。为此，我还是要旗帜鲜明表明下述基本的立场，尽管我对学校或有关方面是否会有所理解，不抱任何期待：

大学就是要以教学学术为本、以追求真理为本、以捍卫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为本，以守护社会的精神和良心为本，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就是要以服务学生、服务教师为中心，学生忠于学习之本分，教师忠于师道之操守，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师生从事教学学术活动，有权要求使用空闲的教室、会议室、报告厅等活动场所，学校的管理者必须配合提供，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除了官方占据资源畅通无阻举办的外，必须鼓励、允许学生社团、教师个人申请和组织各种类似的学术教学活动，这一点，天经地义；



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外，为培养健全人格，为锻炼创造力、想象力、团队合作能力，所探索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学习和社会服务活动，校方除了给予必要的业务、安全等的培训、指导和监管外，不得压制，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教师课堂上的授课内容，免于外在强权的干预，但教师自己必须受到学术伦理、价值中立、允许质疑等理性规则和基本良知的约束，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公权不得进行政治奴化教育，教师不得进行政治煽动教育。但是，学术研究有必要及时回应政治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予以提炼，并进行客观化、学术化、全面化、中立化的思考，这一点，天经地义。

以上所表明的立场，其实皆是在被动维护某种消极的自由。这些立场，是基于大学教育基本性质而提出的，我不过予以归纳总结，其中没有任何独创性，也不需要任何独创性。我知道我对这些立场的重申，不会取得什么现实的效果，但我相信它们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事关中国大学教育生死存亡的底线和原则。一句话，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政治回归政治。也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本来 12 月 1 号预定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活动，将暂时中止。理由不在于我们没有地方读书，我们完全可以再次站着把它读完。但是，由于外在的干扰，从这次韦伯的读书效果来看，我的学生黄兴超、高鹏，以及我本人，尽管对韦伯这本书早已读过数遍，但现场发挥都不在状态，而另外两个学生的发言，也因心神不定而只能照着稿子念，甚至那个女生的发言也因定不下心充分准备，只能念些别人的韦伯研究成果。这完全违背了读书会的初衷，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下一期阅读，那就不是在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在为反抗而读书，那就是把读书作为工具，那就违背了以学术为业的精神。所以， 我们必须等到心态平和后，再继续阅读最后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但肯定会阅读的，时间地点待定。

围绕这次读书会被禁事件，我分别写了两篇文字，除了这篇长文字，还有一篇是我在周六上午焦躁等待着下午的过道读书会之前，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写给我的学生的公开信《关于读书会风波致我的学生》。我就权且把这两篇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尤其是作为阅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后的读后感，以向韦伯这位纯粹的学者、高贵的灵魂致敬！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育者，我为今天的大学堕落而感到羞耻，这种耻辱感尤其针对我本人，我是其中



的一个分子。今天没有谁有资格说自己是个称职的大学教师，一个都没有。我们就是堕落的一代，没有任何光荣可言，我们愧对祖先和子孙。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e6c4101017r6b.html 。）

【返回目录】





【治】

7-3 陈向阳：大学的气质



“精神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孕育了现代大学的独立气质。失却了独立气质的大学，必然成为生产奴仆的工厂和无耻文人的乐园。”

现下，有关大学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积极方面来看，就是大学的发展在数量、规模和速度上的扩张和提速；从消极方面看，就是学风的恶化、学品的堕落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腐败的加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如何在保证大学“量”的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大学“质”的发展？或者说，在注重大学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也注重或者说更注重大学的人文功能和精神功能。笔者认为，这个“质”、这种人文功能和精神功能的集中体现，就是大学的气质问题。

应当说，不同的大学，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办学风格，形成了不同的个性特征；但共同的禀赋品性和社会职能，又使不同的大学拥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对于现代大学而言，这种基本的精神气质就是独立的气质、包容或自由的气质和高贵的气质。当今中国大学所缺乏和遗失的正是这种独立、包容（自由）和高贵的现代气质。

现代大学首先应当具有独立气质。精神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的三位一体，塑铸了大学特立独行的人格和风骨，进而凝聚和内化为现代大学稳定而恒久的独立气质。反过来，现代大学的独立气质也主要透过精神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显现出来。



作为一个高度专门化和密集化的精神活动场所和精神生产组织，思想和精神成果乃是大学产品的一般表现形式。而思想活动、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在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社会生产及其产品中，又最具个性化，最富独创性。显然，没有独立，就难以绽放灿烂的思想之花，也无法获得健硕的精神之果。独立因而成为精神思想活动与生产的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和本质特征。精神思想独立也就成为现代大学最基本的气质，成为大学独立气质的灵魂。一旦失去精神思想独立，大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便所剩无多。任何精神思想的依附或不独立，只会导致精神的枯萎和思想的堕落。

大学又是一个高度专门化和密集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组织，其基本职能乃是开展高层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活动。现代学术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大学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必须恪守自由原则和科学态度，具有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而学术独立正是实现这些目标和价值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没有学术独立，很难产生真正科学、有价值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无法取得积极而有创建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成果。至少会造成学术成果正面效应的最小化和负面效应的最大化。学术独立也是精神思想独立的具体承载和外在表现，或者说精神思想独立往往经由学术独立体现出来。学术独立因而成为大学独立气质的主体。

然而，无论精神思想独立还是学术独立，都必须建立在大学体制独立基础之上，都必须以体制独立为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所谓体制独立就是官校分离、政教脱钩，使大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办学主体。在大学内部则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显然，体制独立是大学独立气质的基础。没有独立的体制，精神思想独立和学术独立又“毛之焉附”？在一个依附体制中，思想家和学者是无法真正而普遍地自由从事独立的精神思想活动和学术研究的。

总之，精神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孕育了现代大学的独立气质。失却了独立气质的大学，必然成为生产奴仆的工厂和无耻文人的乐园。

现代大学也应具有包容气质。这种包容气质不仅浅在地外显为学科类群和专业体系的无所不包，更本质和内在地凝化为一种思想包容，即蔡元培先生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中当然也逻辑地包含了价值包容、方法包容和文化包容。在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几乎各种思潮和主义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生存空间。大学因而成为不同思想流派的交汇之所，各种意



识形态的角力之地。正是它们的共处与兼容，维护着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它们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则推动着人类思想的不断创新。没有包容，大学就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生气和活力，思想创新和学术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前提，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就不复存在。因此，包容气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气质，它展现了现代大学海纳百川、海阔天高的胸襟和风范。失却了包容气质和自由气质，大学很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监禁所和思想屠宰场。

现代大学还应具有高贵气质。大学是从事精神生产、思想创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之所在，这些活动与功能无不体现出一种高层次、高境界、高品位和高素质特征。大学因而拥有了一种高贵气质。这种高贵气质不仅应表现为社会价值、职业声望和经济地位的高贵，更应是一种精神高贵，如人格高贵、情操高贵、品位高贵和道德高贵。高贵气质使现代大学具有一种排媚拒俗、求真唯美的本能和风度。大学的这种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气质往往为专制独裁所不容。独裁者每每以消解大学的高贵气质进而使之屈服于专制淫威为快，每每以征服并奴役大学学者为其取得精神胜利的主要标志。贱以高贵必然贵以卑贱。伴随高贵气质失落而来的必然是唯权是尊、趋官若鹜心态和氛围在大学的普遍生成。

独立、包容和高贵气质的汇合交融，塑铸了现代大学独特的精神气质。但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莫不具有如斯之气质特征。有无现代气质也就成为考量大学现代化状况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大学现代气质发育的过程。

在我国，一百多年来，伴随现代大学的兴衰演变，大学的现代气质也经历了一番长消递嬗。早在清末民初现代大学初创之际，大学的现代气质即已初露端倪；到五四运动前后，自由、民主、平等、开放逐步成为许多大学尊奉的办学原则和治校方针，独立、包容、高贵的现代气质亦逐渐发育。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堪称典范。新文化运动期间，在蔡元培主持下，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废除了旧北大的陈规陋习，确立了民主建校的办学原则。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北大迅速崛起。此后，北大师生为维护这种自由和民主，为维护北大的精神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体制独立，进行了顽强持久的奋斗与抗争。从而孕育出独立、包容和高贵的精神气质并形成为优秀的历史传统。如果说北大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其



最大的贡献既非人才也非思想，而是这种独立、包容和高贵的精神气质以及由此形成的优秀传统。这种气质不但是北大、同时也应是中国所有现代大学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大学的现代气质却明显退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长期严密控制下，大学的独立地位不复存在。从法律地位、管理体制到办学模式、运作机制，大学都不再独立自主而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了体制独立，学术独立和精神思想独立也就失去了保障和依托。独立气质因之亡失，依附气质因之繁育。大学沦落为培养思想奴隶和精神侏儒的场所。另一方面，长期的文化专制、思想高压以及学术研究的泛政治化，致使大学的包容气质和自由气质愈益消退，狭隘专横气质却愈益繁盛。于是“百花齐放”变成了“一支独秀”，于是精神枯萎、思想逃亡、学术凋敝；于是出现了精神迫害和思想监禁。独立气质和包容气质既已亡失，高贵气质便无处藏身。在卑贱气质的侵逼之下，高贵气质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而攀权附势、奴颜卑膝乃至为虎作伥等卑劣气质则在大学校园大行其道，官学作风、小市民心态、奸商气息乃至各种痞俗之气亦沉渣泛起。大学气质的严重退化和劣化，意味着大学精神品格的平庸和堕落。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十年，至今无有根本改观。即使那些所谓名校、老校，在这方面于今也大多只能以历史为傲。

尽管大学的独立、包容和高贵气质一度中衰，但它始终是所有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大学人共同而恒久的精神追求，人们也一直在为恢复和重塑我国大学的现代气质而不懈努力。这种努力在近二十年表现尤为显著，改革开放也为此创造了一定条件。一些大学已开始隐约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为培育这种现代气质进行了初步尝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愈益持取独立立场，尊崇自由精神。但由于大学体制改革、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几十年因袭下来的大学的依附体制几乎依然故我。精神思想独立和学术独立虽趋势明显，终因体制不独立而无所依托、难以为继。而近年迅速膨胀的盲目而无度的金钱崇拜、产业崇拜和市场崇拜，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过大和过度干预，以及由此而来的许多没完没了的由非学术机构所导演的“学术游戏”，更使大学气质劣化问题雪上加霜。在巨大的和非正常的官、商双重力量的挤压、冲击和胁迫下，大学的独立空间已所剩无几。大学的独立气质既难以生根繁衍，包容气质和高贵气质便无法正常发育。没有制度保障，大学现代气质的培育形同沙滩建屋。



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出现已逾百年，人类社会也已跨入崭新的 21 世纪、走进新的历史时代。然而，我们的大学在精神气质上却似乎与现代标准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差距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较之于经费的短缺、人才的匮乏等外在和“硬件”的问题，现代气质的缺失恐怕是当今中国大学更深层的忧患。很难想象，缺乏独立、包容和高贵气质的大学能培养出具有现代气质和人文精神的学生、人才和公民。

（陈向阳：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原文地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21.html ）

【返回目录】



7-4 杨照：大学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开放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培养青年学子不一样的视野，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在 1978 年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那是当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视为全台湾最好的高中。入学没多久，就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名字不断在学校刊物文章以及老师、学长的口中反复出现，那就是贺翊新校长。然而那个时候建中的校长明明是黄建斌啊，为什么贺翊新名字出现的频率，远超过现任的黄建斌呢？

之后我进了校刊社，仔细查了资料，发现贺翊新先生两度担任建中校长，第二次是 1967 年卸任的，换句话说，到我入学时，贺校长离开建中已经十多年了，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在校的所有学长，不会有一个人亲炙过贺校长，甚至就连老师们，恐怕也有一大部分是贺校长离开之后才进来的。

那为什么还要一提再提贺翊新？提贺校长，为了给建中一个精神的源头，贺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来台湾之前，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所以在建中每次有人讲起贺翊新，就必定同时讲“北大精神”。一间在台湾的高中，却以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庞大距离的“北大”，作为精神归宿，这些建中的师生，又对北大能有多深刻、多真切的认识呢？

当然没有什么深刻、真切的认识，“北大精神”在建中其实只有一项具体内容，那就是“自由精神”，建中师生是借由贺校长的名号，高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标杆——一种尊重“自由”，允许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可以不必按照定好定死的路走，可以在别人安排好的标准答案之外去找答案的空间。

1981 年，我从建中毕业，考进了台大历史系。那是“美丽岛事件”及军法大审刚过的一年，也正是台湾政治风气最为肃杀的时刻，民主运动受到重挫，国民党的监控管制陡然升高的时刻。



然而，就在我大二那年，一位刻意标榜党外身份的学生代表竟然打破传统，在全校代表大会选举上，击败了国民党党部提名的人选，当选学代会会长。那一刻，选票开完，确定创造了历史先例，确定让国民党党部大为尴尬、愤怒，我们一群参与辅选的同学们，怀抱着胜利的快乐，和不知是否将遭到报复惩罚的不安，一起从活动中心走出来，不需要言语商量，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路走向位于校门口的“傅园”，也就是台大已故校长傅斯年的墓园。

进入“傅园”让我们觉得安心，冥冥中仿佛和中国自由主义接上头了。早在 1950 年就去世的傅斯年，越过了三十年的漫长光阴，依旧给予我们追求自由自主，努力摆脱威权控制的勇气与力量。

和其他很多社会一样，在最封闭、最黑暗的时代，台湾的学校，大学和少数的精英高中，保留了难得的微光，保留了知识与思想上的相对自由。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青年学子在这里阅读外面社会不容易读到的书，听到外面社会听不到的意见，培养了他们不一样的视野。那“不一样”，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也是未来台湾得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主要基础。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杨照，台湾作家，原文地址：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2-05/18/content_45724609.htm ）

【返回目录】



【节】

7-5 黄慕春：知识分子的坚守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

话说前段时间有人让我给徐晋如先生说说，如果可以，让他到一五一十开博，于是没等两天，我真的给他这个“文化遗民”发了一张纸条，准备实施我的邀请，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清楚的记得还顺口编辑了几句顺口溜的东西。“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翘望九州，悲兮痛兮；独立苍茫，与君神交。”

在谈他的“回信”之前，先说说这个“文化遗民”的出处。在徐晋如看来，在这个媚俗成风的当代中国，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化遗民，而且还可以“以文为证”：“‘ 我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文化遗民。我是古典中国的孑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惟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徐晋如这样描述自己。”

这是一篇题为《徐晋如：选择做一个“文化遗民”》的文章里的第一句话，作者是一位唤作“阚菲菲”的女士，因为是《中华读书报》里的文章，那么也许是一位采访记者吧。



我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的这几句话。“在向称保守的清华，他无疑是异端，但当他终于转入中国文人向往的最高学府——北大时，他的独特、敏锐，让他仍然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个性终于导致他没有能获取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而不得不选择就业。当他失去保研资格以后，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回到北大的费振刚教授，在学校的党组会议上说：‘我们北大的研究生保送制度有问题。我们中文系最有学术天份的学生，竟然没有被保研。’”

不止如此，我也非常感触这几段。“没有从学校学会生存技能的他，在刚毕业时，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跳槽、挣钱、买房子，也不能免俗地上网聊天、发帖子，骂人或者挨骂，经常困顿不堪。但其锋芒毕露的才华无疑对他人生历程的改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年，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永正教授未见其人先见其诗，惊为‘天才’，也全因着这一份推崇，使其跳过硕士阶段直接进入中大读博。陈永正教授为了等徐晋如投考，甚至推迟了一年退休。陈教授对他的挚友吴承学教授说：‘像晋如这样的人，生存在这个世上会吃亏的。我招他，就是为了要多保护他三年！’读完博士之后，由于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先生一直对其赏识有加，徐晋如得以顺利执教深大。”

其实我从没与徐先生见过面，当初我在新浪试博，读过他几篇文章，很受感动，于是发出加为“好友”的试探，其实狡黠的我也是有两层用意：一，想看看作为一位自我标榜不避嫌猜的“草根名士”，窥测这些“名人”有多少风度，多少气度，多少辨识度。当然，为了显得自己也不是攀附之徒，于是又顺口胡诌了一首打油歪诗，“重峦叠嶂山本色，小桥流水旧人家，我有奇思发一叹，天地万物驻芳华。”二，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实话实说，对于真正欣赏感佩的人，我从来不吝于表达我的“仰慕之情。”

可喜的是，他居然成为了我的“神交已久”的“好友”。而且我每次发去“纸条”的时候，据说很忙的他，还是坚持予以回复，而且每次都是那么“言简意赅”，不温不火，颇有点镇定自若的名士风度，换了小气而又多虑的人，也许微微会有一些不快，但我觉得，这或者就是他的特色吧，中国传统文化推许的所谓“素交”，或者，正在这种地方体现。

所以，这一次，当他回复说由于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再另外打理一个博客了”，还说“谢谢”我的好意的时候。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客观讲，我与徐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的，比如对于民主的看法，比如他似乎对于儒家推崇过甚，又比如他对胡适的态度，还比如他瞧不起梁启超顾准这样的所谓“思想家”，而极为推崇他心目中真正的国学家：康有为，钱穆，潘光旦与徐复观。但是，我向来认为，真正的朋友其实并不需要在所有观点上强求一致，重要的是，是否在基本的“价值观”上，与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上保持在可以相互接受的程度，这才是成为朋友互相砥砺的关键。

在我看来，徐晋如先生虽然与我素未谋面，可在我心里，常常也许是“非常武断”的认为：在时下浮躁喧嚣的中国，他就是一位有良心、有热情、有着自己操守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在某种可以比拟的层面上，我与他不但有共同的追寻与期许，而且在很多生活经历上也有共同的遭遇与心路历程，因为我也不怕脸上贴金的说：我也是个不妥协的人，虽然我也时或感到生活的逼仄，谋生的不易，求人时那种看人脸色的难堪，以及这种难堪带给我内心的痛苦与焦躁、自嘲、愤懑、孤傲、勇毅、彷徨等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感纠结。

有一天，我又跑去“拜访”他，突然又看到这篇文章：《关于龙应台的一段对话》

“阿渐：龙应台写了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当肉麻。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那她就是余含泪——估计是看中大陆这个市场了。

我：这本贱书非常流行，老子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关于龙应台女士，作为一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如雷贯耳，我是比较欣赏的。最早知道她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吧，那时我拿着家里的钱开着一个书店，从一本《名家经典随笔选》中读到北大退休教授吴小如写的一篇题名《张爱玲与於梨华》的文章，知道吴先生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时受到了龙应台的接待，并赠予他张爱玲的全集，从此知道“龙应台”这个“杂文家”的名字。据说风格很犀利，很有鲁迅的遗风兼雄风，但对于鲁迅也有自己的批评，比如在一次读书访谈节目中，她说很欣赏鲁迅这个人，但对于“后期的鲁迅”很多论争文章不太欣赏，觉得有“意气用事”的地方或嫌疑，让我对她又多了一层了解。



但她的那些杂文集（比如《野火集》就是她的专栏文章结集，据说曾经风靡台湾）我倒是一页也没翻过，也许是觉得自己要看的书太多了，也许是觉得她对鲁迅“后期”的评骘，也未必有我了解的“深入”吧，虽然也不能说她没有自己的根据与见地。因为在我看来鲁迅是有一些见识不周或言论不谨之处，比如有人所谓误信主义，但正如古语所称执于一隅，贤人不免。如果讲论争，以杂文撰写粗略分期：“前期”与梁实秋的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争辩或有意气的地方，但“后期”与“创造社”或“太阳社”的争执，甚至蛰居上海时与那些什么“洋场文痞”或“清客帮闲”的唇枪舌战，我看也谈不上什么意气，这一点恐怕龙先生也有点“失察”了。

至于这本《大江大海》(台湾天下杂志出版)，其实我在网上早知道，一直没有机会翻阅，一来网上也好，一五一十也好，对于这本书已经有过很多读者的评述，或者大致也了解了怎么一回事，于是就“有待来日”了；二来觉得无论就杂文而论，还是文学而言，恐怕她的文章也未必就很对我胃口，何况，我虽读书不多，但对于现代文坛却偏偏比当代文坛涉猎得多，似乎单从散文随笔杂文而言，我也偏偏喜欢现代的几位作家多一点，这或者一方面源于我的学识不够的固执，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独有的偏见作怪吧。

对于龙先生这本从特殊视角进行透视，文学味道很重，材料完备，而且带点“钩沉”式还原性质的历史大著，我虽没有捧读，但想来或者还是深有所见的，否则也不会这么流传，应该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上面徐晋如博客里的短文，我却有些自己的看法，尽管我对于这位“阿渐”最后那句“看中大陆市场”的话，很不以为然，对于徐先生后面的“粗口”也着实不敢苟同，觉得以龙先生多年的文坛宿将的地位，为了一点可以博利的市场而有所作为，未必有点小看别人了，以我之见，根据时下读书界的一些反应来看，龙先生断不会那么势利与功利的。这恐怕有点“小人之心”了。

另外徐先生的话也或者非常武断，怎么看都没看，或看了一点，或是没有读完，就说“很贱”呢？虽说古人读书有“望气”一说，钱钟书引语所谓“不用细看所评的书，把鼻子一嗅，便知好歹的”，但用错了地方，也是不是有点“不够圆通”呢？



但是，对于这句话，“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我却有点自己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其“事”并非“阿渐”同志的“杜撰”，那我就觉得，至少就这句话而言，龙先生的确有点——矫情了。当然真正的坚守是在于内心，也并非硬碰硬的完蛋，才能算数。只不过这话应该别人说，自己说就多少有点标榜。

因为我真正觉得，比较而论，放眼整个现代文坛学坛艺坛等等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海峡两岸真正谈得上是在“坚守”，以笔者愚浅之见，台湾的李敖算是一个，大陆的傅雷与陈寅恪算另外两个，原因我想不用我来多说，在“切身处地”面对熏天的权势时，还有谁能比坐牢的李敖与上吊的傅雷还有瞎了眼睛的陈寅恪，以及胆敢以一介书生对抗蒋大总统的安徽大学的刘文典教务长，更能“坚守”呢，除了“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梁漱溟先生，马寅初先生，还有康同壁女士，以及台湾的雷震先生，殷海光先生……恐怕以我不多的阅历，就没有几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谈得上其实很不容易的“坚守”吧。

所以龙先生的所谓“坚守”，在我看来，假如放在一个更宏阔的空间，作出更严苛的解读，或者的确值得商榷考究。

记得李敖先生有一次在《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录像音演讲》里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佛兰克林就指出：‘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不过，尽管在美国落地生根，对中国不落叶归根，各位在感情上，对中国总有一股难舍的成分，这种难舍的、依依不舍的成分，就是‘全美华人协会’成立的根源。”在对赴美的华人同胞做了一些“感同身受”的体谅与鼓励以后，李先生话锋一转，觉得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用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到美国谋求犹太人慷慨解囊的事实，相较之下，“说明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努力去做一个去者的身分，以一个离去的人的身分，努力帮助留守在中国的同胞，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多了。”

于是李敖先生最后把“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挪移一下，变成，“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言外之意，在台湾当时蒋家王朝权势熏天的时刻，无论墙里墙外，只要你肯尽心，为台湾的民主事业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原则上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是无可非议，但最值得称道以及最能称得上坚守的，恐怕还是像他李敖一样，“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



由。”等而下之的当然就是人在海外，既谈不上有什么真有帮助的动作，与精神上的慰勉，又不能归国与“李敖们”一起面对丑恶现实“共赴国难”，至少也要实实在在尝尝生活的艰辛，那就有点——没种了，矫情了，或怎么了。

在一部为了生存自由人格理想奋斗不息的人类历史上，既有斯宾诺莎、伏尔泰、茨威格这样“远赴海外”被动捍护自身伟大人格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有像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这样主动争取的杰出实干家，或者无论何去何从，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感慨唏嘘到不能自已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尽管自己大半生流亡在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鞑靼人的俄化后裔，就像他那本《说吧，记忆》里他的那位身为法学家兼政治家的父亲一样，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的首批议员，尽管世代贵胄，养尊处优，却毅然用自己的良心“坚守”着，宁愿身处囹圄，也要与沙皇的开明专制（这话不矛盾，如果你稍知那段历史的话）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却在苏维埃当政以后逃到柏林，竟在流亡期间一次演讲活动中，为了以身护友，倒在了极端保皇党的一位刺客的枪口之下，这应该说给了因为深知政治的丑陋与庸众的盲动，于是就绝不过问政治却避不开政治对他的过问的纳博科夫很大的刺激与震撼，让他这位对于个人遭遇一向淡然的不世文豪，毕生把自己的父亲视为一种骄傲，视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典范，一位普希金那样伟大的诗人一样的人物，尽管他的父亲虽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写过很多法学政治著作，却没有写过什么优美的诗篇。

纳博科夫曾经这样评论他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俄国伟大的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则，在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视同仁的政策和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称的学校去学习是正确的。”（第 214 页）“他熟知好几个国家的散文与诗歌，能够背诵几百首诗（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费特——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费特很好的文章），是一个狄更斯的权威，除了福楼拜之外，还高度评价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见是三个令人生厌的平庸之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第 205 页译者王家湘。）



按照有些人的思维定势，既然遭受了苏维埃的迫害，纳博科夫又是著作等身的人，一定会在笔下予以强烈的暴露宣泄与无休无止的咒诅，但是对于这些我也曾想当然的揣测，纳博科夫也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对于苏维埃政权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倒是没有多少嫉恨与遗憾，就像钱钟书《围城》里那些自夸被日寇毁夺的那些其实未必存在的"巨大财物"的人一样，他似乎最为痛惜的，就是苏维埃政权对于无比优美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与蹂躏，那是一种愚昧与野蛮的表现，对于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由精神的灼伤，这才是他最为痛心的事情，并与他强烈的思乡情结融为一体，而凝固为一团无法化开永不磨灭的苦痛与哀愁。

"下面的一段不是为一般读者所写，而是为某一位白痴所写，他由于在某次危机中失去了大量钱财，就认为自己能够理解我。

我和苏维埃专政的旧怨（一九一七年以来）全然和任何财产问题无关。我彻头彻尾蔑视那些因为他们'窃取'了自己的金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们。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对失去了钞票的悲伤。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了向往适合的生态一隅的权利：

……在我的美利坚的

天空下怀念，

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第 69 页）

他只有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才能抒发自己作为一个"文化遗民"的忧郁与沉痛。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终生对那种"使命文学"或"主体思想"深恶痛疾的一个重大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总在各种场合对于亵渎文化僵化思想的人和事，充满了不屑一顾的嘲弄与夸张犀利的讽刺，而且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为了谋生，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行业：网球教练，拳击教练，昆虫研究员，临时演员，家庭教师，报刊编辑，大学教授，职业作家等等，在我眼里，他既有狂放的一面，也有深沉的一面，集学者的精深博识与艺术家的天马行空于一身，对人性的理解



又是那么细致到只有乔伊斯能够与之媲美，最特别的就是他在表现与玩弄语言方面的卓越天赋，这些都与他前半生漂泊流离的生涯既有联系，又能以一种非常平静写意的方式，形成一些决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生活的动荡与内心的坚定，人事的丑陋与在艺术追求中捕获的美丽——犹如他最喜爱的蝴蝶那样五彩斑斓，身世的坎坷与心胸的豁达，媚俗之风的猖獗蔓延与高雅情趣的越发沉淀，等等，仿佛正是这些交织在现实与梦幻之中给他力量的东西，让他忍受着，支撑自己穷困潦倒而又兴趣盎然的流亡生涯，因为他有时竟然在大热天蹲到盥洗室中奋笔疾书，挥洒他与众不同的写作艺术与不凡遐想，但是如果你不细细品味，又怎么能够从他那些轻逸超妙的诗意盎然充满智慧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中，察觉到他其实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对于真正的文化事业的坚守之情呢？他是真正的文化人，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不媚俗于大众，也不谄媚于权力——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力，相反，如果你不能从他幽默、诙谐、机智、潇洒、另类、卓异、高雅、超绝的天才般的所有作品感受到那些质素，你就领会不到无论墙里墙外，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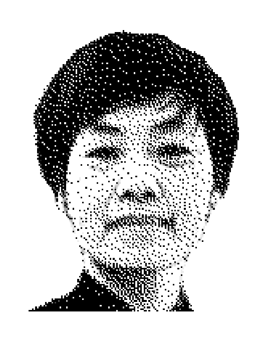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黄慕春，文学评论家。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674329705b23da1）

【返回目录】



7-6 崔卫平、金雁、贺卫方、郭于华：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





“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所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做一个反省。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来。

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

主持人语：非常高兴今天在座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这么多生机勃勃的力量，你们是现在和未来的新闻生力军，很愿意与你们一起讨论相关问题。

今天的主题为“知识分子”。听上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看着有点朦胧，让我们尽量把它具体化，与当前现实联系起来。比如说，在今天知识分子如何完成自己的角色，他应该有怎样的承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正好是不同领域的，贺卫方老师是法学家，郭于华老师是社会学家，金雁老师是历史学家。他们正好可以结合自己不同的专业工作经验，来谈谈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又被提到桌面上讨论？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饱受争议的事件，在媒体上的曝光率比较高，比如抄袭。假学历也算是相关的吧。说实话，真的不希望同行们以这样负面的面貌进入公共视野，因为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如果还能用这样的“大词”的话），做一个反省。

我们也不希望像在许多讨论中出现的那样，针对某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当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朱学勤先生那句话很有道理，“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总是谈论原因，令我们原地不动。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而是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

知识分子的自身相关

崔卫平：作为知识分子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这就带来一个自身相关的问题。比如，存在这样的指责“知识分子不作为”、“知识分子不争气”，那么说这话的是谁？他本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肯定也会自我批判，也会自我反省或者自嘲，但是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人们说这话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好像说的是别人，而不包括自己在内。

这个自我相关的问题，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个从古希腊开始流传的段子是这样的：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说，克里特岛上的人们说话都是撒谎。那么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它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克里特岛上的人都在撒谎；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人，那么这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了。他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他这句话就可能也在撒谎。总之，这句话无法圆满了。后来应该是罗素吧，将这个命题又发挥了一下，他的句式是——一个理发师说，他替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是否要替自己理发呢？如果他不替自己理发，那么不替自己理发的人，正是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他如果替自己理发，这又违反了他最初的逻辑。



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听上去那么绕来绕去。也就是说，不要忘记了你自己的存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那个位置，你的确是占有那么一席位置的。因此，你不能脱离自己来谈论世界，谈论这个世界中的事情。也许，这个世界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客观”，因为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便处于你的感受、认知和把握之中。也许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力量，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哪怕是很小的变化。最低限度地——因为你的某些努力，你自己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变化难道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正是世界本身发生某些改变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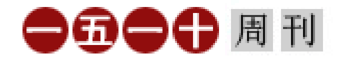
我们将这个自我相关的逻辑带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来。这意味着当知识分子本人在说“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能显得仅仅在说旁人，他不能显得那是在谈房价或者物价，不能那样漫不经心或者超然物外。他不要忘记了，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毛病也好，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担当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跟他没有关系。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逃脱不掉的。因此，他需要将自己所说的，与自己的行为对照起来。也就是说，他需要将自己带进去。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

而同时知识分子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知识分子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因此，在谈论这个社会时，在谈到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即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时，知识分子同样不能将自己排除在外。知识分子是运用“概念”而工作的，当他的思想乘上翅膀飞向遥远的天际，那么他首先要过一道门槛，那就是他自己的“肉身”。他需要将自己的“肉身”放到他的真理中去。他需要把自己放进去煮。

知识分子还需要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估计。如果说，掌管符号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这个社会（民族）价值的保存者，价值的守护者，那么在今天，我们社会中“价值”的声音已经微乎其微。如果说知识分子是通过“理念”（理想）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年代，“理念”的力量更加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在你身边正好站在十二个使徒，他们永远等候在你的一侧，单等着把你新发明的真理拿到这个世界中去，让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让它们在世界当中得到实现。对不起，没门儿！

所以需要你自己来践行你的主张，让它们首先在自己身上得到体现。只有这个真理对你自己有意义，那么它才可能对别人有意义。只有这个真理给你本人带来益处，那么它才有可能给





别人带来益处。我欣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一部电影中，通过人物之口所说的，“我拥有一个自己够用的上帝。”这就是说，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而只有让真理在自己身上得到见证，它才能够对别人具有启发性。

为什么如此强调自身实践，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奇特的知识分子传统，那就是策士的传统，以及宦官的传统。所谓策士，是给皇帝出主意的人。他指望自己的想法为皇帝所接受，最终通过皇帝的政令来施行，这是一个目光向上的眼光。它只能为皇帝带来真理，而不能为自己和其他普通人带来真理。而宦官的传统告诉我们，他这个人的“肉身”早已经被排除在外，他的身体不在这个世界上，当他说出某些言辞时，从未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在大地上行走。宦官忘记了自己还有身体上的尊严，忘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管谈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好，还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也好（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首先做起来的问题，而不要推卸给别人。这是靠一点一滴来积累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话题，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启动，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去。

最近，我看到我原来的文艺学同行王岳川教授写作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其中认为“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觉得不知道他本人身在何处。而我上回听说他，是因为他正在研究“超越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

“猫鼠博弈”的启示

金雁：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在俄罗斯东欧方面。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之前我并没有评论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会有这种状态。我以前曾经说过，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涉及到一个大话题，知识分子有一种“双头鹰情结”，就像俄国国旗上画的一样，互相较量拉车的两方面。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



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猫鼠游戏当中的博弈，实际历史案例中是有不同的答案的，这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观的不同。为什么有很多道德层面无可挑剔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权利是要放弃的，这点来自不同国家的观点也不同。比如俄国，俄国看到了暴民政治对文明的颠覆，所以他们主动退下来。他们说既然制度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当中肯定有善有恶，必须把人性的善培养到极致。他们就走到了宗教哲学里，他们觉得参与需要勇气，但退出更需要勇气。这些人干脆脱离政治，在道德上积累了很多东西，但他们放弃掉了现实。这给我非常大的启示，这就是所谓缺席者的权利，当然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缺席。但整个社会变革当中的空场，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这不是简单的对错。

有一种情形值得关注，东欧在高压之下，在坦克政治之下，在布拉格政治之下，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学生也曾经问我，既然俄国所有学者都是天然反对派，为什么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些人都不见了呢？我说沙皇的压迫和斯大林的相比是太小巫见大巫了。压迫到极致的时候，你还没有发出声来就已经被掐灭了。所以这种状态下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不能生存了。这种状态在东欧也很明显，在东欧很多人试过了，他们转向了宗教，宗教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哈维尔总说他感觉他的生命之上，有一个来自天籁的东西在指导着他。很多东欧国家也会转向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人对现政权仍然在关注。我们要看到，你利用的资源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

还有人民的道德。来自人民的道德基本上是一个民粹派的逆转，大家觉得精英是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承担代价，少数人获得了成果。这就是反改革的结果，民粹主义是对道德的颠覆——只要目标是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善至善行不通的话，我就以恶至善，这种状态下，无其不用，使得建立以后的政权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为了从老鼠变成猫。但这个体制会形成一种淘汰机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最早出局的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剩到最后的都是敢出手者。这种道德虚无感从政权反射到整个社会，然后从社会反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脱离不了这种土壤。像俄



国所有黄金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进官僚系统的只有 17%，所以他批评官僚不怕开除公职，你赶不走我。所以政权成立以后，这是底气不足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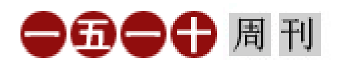
而民粹主义是具有易变性的，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大家都希望有一种强者来给自己提供保护和安全感。以高尔基为例，他作为民间的学者是同情革命的，但他又是人道主义者。他在 1905 年革命以后去了美国，回国后就变得激进化，和列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自始至终他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并没有被消灭。他骂列宁，但列宁知道高尔基是民主党的钱袋子，职业革命家是不挣钱的，是要花钱的，钱来自什么地方？就是民间反政府力量的关注，高尔基掌握着钱，所以列宁让别人来得罪他。

高尔基当时觉得不应该靠数人头的方式解决俄国的问题，他在 1919 年愤然出国，他感觉这个环境滋生了很强的民族主义。上世纪 20 年代末，大家都在抢高尔基的资源，高尔基说，如果远离了权利，个人作用就无法彻底发挥出来。可以看见高尔基又一次改变了，和列宁决裂的人跑到斯大林这里，而且成为了古拉格群岛的赞赏者。有两点决定了这些，一个是民族主义，他看到国家的确强大了，但他没有感觉到，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剥夺的基础上，俄国人也说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强大永远是不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跟希腊时代“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的状态相背离。现在所有人想的是逃离政府，但他无处逃离。

高尔基这时候完全变成了赞成专制主义的倡导者，变成诱捕野鸭的家鸭，这就是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发现，来自人民的道德有易变性和权利的结合性。那些缺席者个人都非常完美，但我只问一个问题，别尔嘉耶夫既然把一切预言到了，那么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呢？只是因为现在俄国找不到北了，才想到别尔嘉耶夫。

所以当代知识分子要理解现实，我们要争取“退下”的权利，退下后要看你做什么。高尔基裂变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只是生命最后的时候，他把档案看完之后没有答应写自传，但他担当了《俄国内战史》的主编。斯大林知道他最有说服力，以他的话出来，民众当然就会信服。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警示，干脆躲得更远，回到猫和老鼠的结局，对待权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资源不同。你可以和做官的朋友谈论问题，他们很明白，但官场中有两种语言，他们切换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的语言交流很难同步。比如你跟经济学家一起谈，会发现经济学家走得很远，但不涉足政治，国内的很多状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你跟官员私下很合得来，但在官方的场合你却觉得无法沟通，这是社会巨大裂变造成的不同利益之间沟通的困难。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所以波兰 80 年代争过怎么改革，争过到底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而我们的"不争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领导者没有看法，那大家也都别提看法。但议会政治下，争论就有点无聊，因为选举的需要，明知道对方说得有理也要反驳。我们现在已经驶到大海中央了，不能下去"摸石头"，那就要看灯塔，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使命

贺卫方：我觉得在座几位都有两个特色，一是我们都关注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学术话题，会写这样的文章、喜欢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参与公众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从内心的愿望来说，想成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直率地批评时弊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经济观察报》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动。记得 2002 年我就参与过报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作了相关的发言。

我个人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介入到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在近乎被胁迫的状态下参与其中。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一些制度建设的呼吁，尤其是对于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中国的这些年是一个案例引人注目的时代，过去我们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立法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一些活生生的个案更能展现我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些缺陷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也能展现我们的生存状况，比如史上最牛钉子户等等，都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们也会关注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引发的不仅仅是法律界的关注，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



科，都可以对这样的案例作出自己的批评，这种多学科“会诊”的做法对于揭示问题症结有很大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理解学院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他们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大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的解读不同，我倾向于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是一个阶层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依托，在大学或者专门的研究机构里获得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历史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几乎都是为了追求实际用途，目的就是为了入仕，这是科举考试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中国的选官制度在全世界特立独行，也使得中国传统知识的格局和地位形成了糟糕的走向，所有人的心智都被引导到通过读书获得官位，获得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辈子在学院里做跟知识有关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做官。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怎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的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就像我们通过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定会看到综合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今天这个社会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死刑，他们相信死刑是一种正义的举措，并且能够震慑犯罪。近年来一些论者主张要尽可能减少死刑，如果要保留的话，应该限于最少数极其可怕的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不应该使用死刑。但这种想法只要在网上提出来，就会挨板子——许多人说只要贪污几百万就应该枪毙，使他们不敢贪污、受贿。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研究人心，如何减少死刑，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几年前，我看到何怀宏教授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感到十分欣慰的原因。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分子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革命家，变成喊口号的人。所以首先应



该特别注重如何去奠定我们扎实的知识基础，我们不再是文以载道，把知识服从于某种外部的价值。

第二点，正由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以知识形态上跟中国古典的知识形态就发生了差异，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乃至整个话语模式都告别了旧有的形态。这可能会构成我们跟传统之间的某种断裂。但传统不是一种死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在从前的典章制度之中，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曾说过：“我们埋葬了诉讼表格，但它仍然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那种貌似死去了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输入域外学说并以之作为改造中国观念与制度的知识人，在这方面经常会产生某种困难的感觉，那就是他所拥有的知识、所倡导的某种东西是跟社会公众的看法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说一个法学家应倡导程序正义，司法要严格依照程序办案件，一个案件是有期限的，某些错误是不应该纠正的（当然，如果是刑事案件错误的判决任何时候都要纠正），民事判决过了期限是不能再提起的，证据的提交也是有期限的，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即使从箱子里找出证据证明法院已生效判决是错的，法院也不会纠正。因为启动司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过程，要从经济角度算账。一个案件不断折腾，整个社会付不起这个沉重的代价。有些时候可能是所谓的有罪的人判成无罪，当时没有找到证据，两年之后检察机关发现证明有罪，还能不能再进行起诉？按照现代法治准则，这是不允许的。之所以如此，是要对国家权力作出限制，一个人不得被国家置于受到两重或者多重指控的境地。这是保证国家权力和追诉犯罪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很难完美的平衡，我们人类不能获得完美无缺的制度。

这样的论证在中国的语境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不大能够接受西塞罗所说的那句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过错导致司法判决的缺陷，如果当事人事后上访，或者通过权力或社会舆论进行干预，我拿着证据说法院判决是错的，就会带来动摇司法确定性的结果。国家领导人对上访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特别不喜欢上访，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人们上访，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出对上访的某种偏好，因为通过上访可以了解某些被下层官僚刻意掩饰的问题，同时



也通过某些个案的亲自处理敲山震虎，对地方官员进行震慑，也表现出自己的亲民。这种又害怕又喜欢的心态带来了制度建设上的指向混乱，也导致司法权威始终无法树立，司法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说到司法独立，我们近代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政府模式，建立了机构意义上的独立法院，但从决策意义上说却不是独立的，中国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级别都有核心，伴随这样根深蒂固的中央动员型的传统而形成的是反分权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论证司法独立的价值，建立独立制度，特别困难。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对司法控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不断的强化。前不久河南赵作海案件，大家最后说当年制造冤案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要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要追究党的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责任，政法委书记还在说我们一定要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实他领导下的机构是最大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都不断强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各自领域中的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跟中国的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这样一种知识传递到这个社会中，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制度。

第三点，我自己感受比较强烈的是，中国历史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只是追求知识，还经常赋予其某种道德的想象。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不是跟道德没有关联的角色，大家希望他作为道德标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跟我们没有独立和强有力的宗教系统有关系。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知识分子之外的宗教系统。于是官员经常被赋予道德的要求，官员不仅有权力，还要有道德。科举取士的确立也跟知识与道德之间难以区隔的考量有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但由于没有宗教系统的情形依然如故，因此某种道德的期望就只能赋予到知识人身上，要求知识人“为人师表”，要在道德上白璧无瑕，对知识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容忍，都是相当强势的社会观念。在具体评价一个知识人的贡献时，我们也特别容易把道德形象作为重要的选项。反之，对于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学人，他的知识贡献也常常被低估。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寻求一种知识分子自身的组织，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也非常重要，但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识的，即损害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大学或者专门研究机关独立性的行为是对每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别大的损害。我们如何去追求和维护这样的独立性，可能是今天无论左右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追求的目标。

超越“平凡的善”

郭于华：我想先谈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起点。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没有区别。普通公民具有的素质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更应做到。作为公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这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大家的基本共识。

我平时也经常跟学生谈到这些事，其实很简单，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玄奥的哲理，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够了。这使我想起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相对于“平庸的恶”，上述的常识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表达为“平凡的善”？即作为平常人、普通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意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如果你遇到利益被损害、尊严被侵犯的时候，你应该去做点什么，应该知道怎么做。最近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清华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所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毕业，这规定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操作时又没有任何合理的变通。为此我与学校有关部门发生了冲突，这当然也是抗争、维权的过程。几乎周围所有同事、朋友都说这么做是没用的，而且自己还会受伤害，想通过个案来改变规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向不合理的规则妥协。当然这可能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



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误区，例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得不好。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是个体原因。

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来自于外部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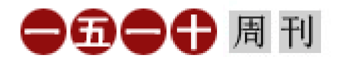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得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做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刚才各位所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比如金雁提到的宗教的力量，宗教也是社会范畴内的，还有 NGO、行会的作用，也属于社会维度。这些在中国空间都特别小、生存比较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还缺少社会这个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行动的指向是应该把社会生产出来、建设出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足鼎立，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但目前我们缺了社会维度，而市场又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权力控制的，权力和资本是一种密切结合的状态，把社会挤压得特别狭小。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

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然，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于华：清华大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330.html?page=1）

【返回目录】



【守】

7-7 周有光、马国川：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



“知识分子要.....独立特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最近，周有光先生“三喜临门”：他的杂文集《朝闻道集》荣获深圳读书月“2010 年度十大好书”，他本人被中华文化促进会评为“2010 中华文化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也将他评为“2010 年魅力人物”。

周有光 1906 年生于江苏常州，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他早年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工作，后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在 85 岁那年，这位“现代汉语拼音之父”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脱离语言学的专业，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孜孜以求，探索真理。他的文章讲常识，说道理，思路清晰，判断明确，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社会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因为得享百岁高龄的文化名人不乏其人，但是没有哪位像周有光先生这样，105 岁的高龄依旧在思考、在写作。



在获得“2010 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之后，周有光先生说，他要继续思考、继续写作、继续出书。他还幽默地说：“我今年 105 岁。我活到 106 岁大概还可能的。我可以继续工作。”

在笔者采访时，周有光先生呼吁，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

再过十余天，周有光先生就将迎来 106 岁的华诞。我们相信，他会继续谱写人间的奇迹。

“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您是 1906 年出生的，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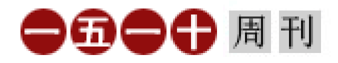
周有光：不是五四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影响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最大。五四运动不是忽然兴起的，而是逐步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的侵略，激起人民的愤怒，惊醒救国的意识。经济方面：洋务运动，一战期间工业萌芽。政治方面：康有为百日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文化方面：提倡国语、切音字、“我手写我口”。新思潮渐渐蔓延中国大地。1919 年五四，受日本侵略的大刺激，猛然跃起，成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而五四运动又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候，我小学将毕业，跟随老师到茶馆演讲。个子矮小，茶客们看不见我。一位茶客把我抱起，站在桌子上演讲，整个茶馆都轰动了。小学生的宣传，都是老师导演的。

马国川：五四运动前后，激进思潮传入中国。尤其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一大批中知识分子向左转。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那些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周有光：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于是知识分子向左转。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延续至今），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政协，长驻重庆。他每月举行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毛泽东的“窑洞对”大家知道，申明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当时大家信以为真。





马国川：建国以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

周有光：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否定知识分子，中国也否定知识分子。名为改造，实际是消灭。

苏联把旧知识分子赶到北极圈以北，等到赫鲁晓夫去救他们时，已经死了一大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把直属单位的人员送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规定大家宣誓，永不回家。林彪死后，大家才回家。

马国川：1949 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遭遇那么多磨难？作为一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您怎么评价那段历史？

周有光：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近来共产党内的学者说：来自俄罗斯。历史学者认为：苏联是俄罗斯的历史误区；一边倒是中国的历史误区。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近年来对 20 世纪 80 年代评价比较高，有人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您怎么评价“80 年代”？

周有光：改革开放比毛泽东年代好，但是经济改革了，政治还没有改革。外国学者研究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状况，半封建、半资本。中国想赶上日本，还得走很长的路。

“敢怒不敢言”

马国川：“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历史上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汇。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章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周有光：在我去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听到人们谈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脑力劳动归属问题。他们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大学教育。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 80%，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教育问题，没有知识分子问题。

马国川：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苏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包括苏联制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

周有光：毛泽东一度想继承斯大林，做共产国际的领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指责，我不承认你，你不承认我。历史学家定出一条和稀泥标准：谁自称社会主义，就承认谁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代，有 40 个国家自称社会主义。现在只剩了六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

马国川：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不佳，有人甚至批评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利益“收买了”。您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周有光：我看没有被收买。至少是，多数人没有被收买。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是喜欢说假话，而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有一天，言者无罪了，他们都会把真话吐出来。

马国川：在各种批评里，对教育机构里的知识分子批评更多。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周有光：改革开放，引进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例外。如果进一步开放，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情况就会改变。

“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

马国川：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古代只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士”的出路主要是做官，“学而优则仕”。今天的知识分子既要有本国传统知识，又要有国际现代知识，知识面大大扩展了，就业的方面多种多样了。古代知识分子很少，现在大学生以百万计，情况完全不同了。



马国川：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什么关系？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政治工作已经成为科学管理工作，离开了宗教和教条。这一新变化我们还所知甚少。研究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要先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马国川：中国知识分子跟外国知识分子差别是什么？

周有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受到先进国家知识分子同样的教育，中外知识分子应当没有基本的差别。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的一元性”。解放后苏联传来的“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已经随苏联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国川：具体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要能够独立思考，要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和新的进展。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知识是人类进化的动力。知识分子既为资产阶级服务，又为无产阶级服务，既不是资产阶级奴隶，也不做无产阶级的暴君。独立特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中国坚持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多吗？

周有光：在我看来很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他们闭口不谈，为的是明哲保身。

马国川：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你怎么看？





周有光：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得到成功，越南模仿中国也得到成功，中国是“从计划到市场”的模式。另一种说法：美国衰落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模式。没有谁来模仿，这个模式不存在。

马国川：有些人说，民主不能随便搞，一民主就乱。美国每一次选举乱的不得了。 你怎么看？

周有光：苏联瓦解，人人镇静，万马齐喑，一丝不乱。你要苏联的不乱，还是要美国的大乱？

马国川：和世界一些国家仍然强调民族国家不同，欧洲开始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欧盟一体化，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周有光：西欧两次大战乱极思治，欧盟一体化取得伟大成功。欧盟是民主制度的新发展，还在继续前进中。亚洲游客问法德居民：你们还会打第三次大战吗？答：不会。问：为什么不会？答：过去两国在同一条马路上开车，你靠左，我靠右，撞车！现在，大家靠右，不撞车了。

马国川：看来，您老并不悲观。一切事情都会渐渐变好的吗？有人说，中国三十年后实现民主。难道真的还要再等三十年？

周有光：三十年不算长。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马国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种乐观情绪在国内蔓延，部分青年人也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位见证了历史沧桑的百岁老人，请您给中国的青年一代说一句话。

周有光：好。“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本文经过周有光先生亲笔修改审定。本次采访得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哲嗣周小平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张森根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家。马国川：媒体人，作家。原文地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281?page=1 ）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

11 月 23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微博发布消息证实，网传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为该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目前雷政富已经被免职。通报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11 月 23 日，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新闻：http://fmn.cc/UdfJap

媒体报道称，由于城市基础建设好，**雷政富**在官场颇受赞扬。不过 2002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2 月，雷政富任垫江县委书记期间，该县先后建设的桂东大道、桂西大道、迎宾大道等项目所用的土石方都由其弟雷政奎承包。此外，垫江县的路灯、绿化等工程也全部由雷政奎承揽。

新闻：http://fmn.cc/TZRsCz

据**雷政富**不雅视频的第一爆料人朱瑞峰的消息，视频中的女子当时年仅 18 岁。当地建筑公司老板想拉拢与雷政富的关系，获得项目工程。于是雇用并训练了视频中女子于 2007 年正月初一和初三拍摄了不雅视频，据悉视频全长 1 小时 20 分钟，记录了雷政富步入酒店到行完房事。，朱瑞峰只上传了该段视频中时长 36 秒的一段。

新闻：http://fmn.cc/S0L5RR

对于视频的来源，朱瑞峰称来自于重庆市公安局“内部的公安干警”。原来建筑商拍摄视频后，给**雷政富**看过内容并以此要挟希望获得更大项目，但未达到目的。朱瑞峰称，雷政富请示了重庆市一名高层领导，王立军（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就成立了抓捕赵红霞与建筑商的专案组，随后赵红霞被刑事拘留 30 天，建筑商也被警方立案调查，法院最终以私刻公章罪将其判刑 1 年。



新闻：http://fmn.cc/S0LGD6

此前**雷政富**曾对外表示网络视频是假的，甚至对朱瑞峰多次表示“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还“拜托将视频资料从网上取下来”。甚至媒体报道称，有传闻指重庆一些工程公司会安排女员工公关雷政富这种政府官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项目，上床后公司会支付 300 元加班费给女员工。不过这些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同时，朱瑞峰表示他本人受到威胁。

新闻：http://fmn.cc/TYK36g

http://fmn.cc/TYK4an

留下很多廉政语录，却又被曝出存在贪腐问题，不雅视频传遍网络的**雷政富**成为网络热议对象，据悉他本人有一套自己的“政商生意经”，曾经工作过的垫江县和北碚区经济情况也不错。

新闻：http://fmn.cc/V4m9qZ

本周官员贪腐新闻

近日**无锡市**滨湖区委书记朱渭平已经被江苏省纪委“双规”，报道称朱渭平被调查原因包括生活腐败，有多名情人，以及可能涉及贪腐资金上亿元。据悉，朱同时拥有数个情人并存在经济问题的情况。同时纪委工作人员在朱的家中搜出数本房产证和存折，并有多名相关人士已被纪委约谈调查。

新闻：http://fmn.cc/V0see2

山西**临汾市**部分酒店长期涉嫌公开赌场、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非法服务，当记者暗访时，服务人员对他们称，“我们是为政府开的，来玩的都是政府的人……”同时，临汾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范主任表示上述酒店无问题，并称“说白了，也许是巧合，市局欢迎报社记者来临汾市采访……”



新闻：http://fmn.cc/UdgFM0

据**清远市**纪委对外通报，英德市原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清远市纪委立案检查，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今年 9 月，郑北泉被自己的下属英德市公安局副局长谢龙生实名举报，称其与一家涉毒团伙联系密切，充当保护伞。

新闻：http://fmn.cc/Tpo0HB

http://fmn.cc/TpnZ6o

近日，在多个网络社区上，**深圳**龙岗区一名社区干部被举报拥有私人物业超过 80 栋、豪车超过 20 部、资产超过 20 亿元，当地表示正在调查，当事人也被停职。期间，举报人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被龙岗警方逮捕，警方称这与其举报行为无关。

新闻：http://fmn.cc/TpJSCe

http://fmn.cc/UdgMau

中国新版护照引发外交风波

中国为了加强宣示主权，在新版护照上印了包含南海的中国全图。这样的举动激怒了在南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邻国。据称，**越南**已经透过驻北京使馆反映，双方正就此事交涉，但仍然没有结果。

新闻：http://fmn.cc/TZRI4n

由于中国新版护照印有的版图包含了争议区域，近日不少旅游者表示，在入境越南时因新版护照而遇到了阻碍，据悉目前**越南**对中国公民发放另纸签证。另外，因将印度提出主权要求阿克赛钦等地区列入中国版图，印度外交部回应，将立即在向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中印上印度地图，地图中将包括藏南和阿克赛钦地区等多处有领土争议的地区。



新闻：http://fmn.cc/UdgUGY

http://fmn.cc/TZRtX7

对于中国新版护照引发的风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在新版中国护照上盖章并非同意中国主权主张，“美国的立场是，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者——东盟和中国去解决。护照内页上的风景图片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新闻：http://fmn.cc/UdgYq4

菲律宾外交部 28 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菲律宾海关拒绝在中国新版护照上盖签证而将在分开的签证申请表格上盖章。声明说，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避免菲律宾在中国新版护照上盖章时被认为承认中国在南海诸岛周围划定的“九段线”。　声明还说，通过这个行动，菲律宾加强抗议中国声称对整个南海包括所谓“西菲律宾海”拥有主权。

新闻：http://fmn.cc/TpK5VS

除了将南海争议海域划归版图，在中国公安部向普通公民发放的新版护照中还印上了**台湾**岛以及日月潭等风景，。台湾陆委会因此于 23 日发声明，表示中华民国政府重申绝不接受大陆相关作为。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28 日也表示，中国的做法是侵害台湾主权，破坏两岸互信等，非常不应该。

新闻：http://fmn.cc/Sro8ZC

本周重大伤亡事故

陕西省略阳县政府 21 日晚间通报称，这个县 20 日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有 5 名矿工被困封闭矿井巷内，因吸入有害气体死亡。目前，发生事故的矿业公司已经被勒令停业整顿。

新闻：http://fmn.cc/UdhGDO



11 月 26 日早上，受大雾天气影响，京台高速**山东**段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已造成 7 人死亡、35 人受伤。媒体报道还称，山东 50 多个高速收费站关闭。

新闻：http://fmn.cc/UdhLHu

11 月 24 日 11 时许，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境内的响水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事故发生时有 28 人在井下。11 月 26 日 14 时左右，贵州响水煤矿事故最后一名遇难者遗体找到。至此，此次事件已致 23 人死亡，5 人受伤。

新闻：http://fmn.cc/UdhC7b

11 月 28 日凌晨**大连市**发生渔船翻船事故，船上仅有 1 人获救，16 人失踪。当晚消息指已经打捞上来 12 具遗体，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新闻：http://fmn.cc/Udhh4f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11 月 23 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舰载机歼-15 成功起飞及着舰，引起媒体关注，被指是中国军事的重大突破。不过歼-15 研制现场行政总指挥罗阳因心脏病去世。

新闻：http://fmn.cc/UdhRz7

http://fmn.cc/UdhRPD

11 月 21 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证实，被称作“乳业打假第一人”的蒋卫锁遇袭身亡，目前警方已经控制一名嫌疑人，据悉蒋卫锁遇害的原因与家庭矛盾有关，他的妻子称其醉酒后家暴。

新闻：http://fmn.cc/SrBogP



http://fmn.cc/TZS8Yz

一名**天津**艾滋感染者被多家医院拒绝手术，最终修改病例避开血检才得以进行肺癌手术，事件引起了网友的争议，也被官方所关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要求卫生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既要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病人的医务人员自身安全。

新闻：http://fmn.cc/SrBzZr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监测数据显示，2001 至 2010 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 56%，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肺癌已成为北京市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而吸二手烟、大气污染、烹调油烟等也诱发肺癌的因素。

新闻：http://fmn.cc/TZRJFz

11 月 25 日晚间，**中国平安**表示，“近期注意到个别媒体报道，其中涉及中国平安的内容严重失实，同时文章采用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方式以及错误的逻辑，严重误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给中国平安造成严重伤害，将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新闻：http://fmn.cc/TZRpXa

由于托运危险品并导致南航飞机落地后货物燃烧，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接连对四家**货运公司**开出“罚单”，注销了圆通、韵达、汇行、启昊四家公司的二类航空货运代理资质，并请各航空公司终止相关合作，不承运其揽收货物。无独有偶，合肥机场派出所表示，他们 25 日在顺丰快递公司托运的货物内查获了将近 30 枚炮弹外壳，据悉这批炮弹外壳是研究所用。

新闻：http://fmn.cc/10V0jd5

http://fmn.cc/SrBHbh



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因卷入一起官司，但法院无法找到她，又发现她已经于 9 月注销户口，通过媒体寻人。张兰身为朝阳区政协委员却加入外籍的情况引起人们的注意，引发热议后，张兰已申请退出政协，并确认注销了她的中国户籍。

新闻：http://fmn.cc/Tpo22h

据广州媒体的报道，11 月 18 日上午**广州**马拉松比赛中，5 公里选手丁喜桥和 10 公里选手陈杰突发性休克。随后 2 人被送入医院抢救，但由于抢救无效，二人分别离世。本月 25 日**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共处置各类伤病员 1037 人，送院 3 人，其中两名为运动员，1 人赛前热身时撞头部导致头皮裂伤，1 名下肢疼痛，1 名观众体力不支。

新闻：http://fmn.cc/TZRqKM

http://fmn.cc/V1jY82

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大三学生小梁 10 月 30 日在微博上称，当地给学生的营养餐只有一块巴掌大的面包和 200 毫升的牛奶，指出配餐存在问题，当地教育局表示已经将校长等 5 人罢免。

新闻：http://fmn.cc/TZRydg

http://fmn.cc/TZRxG8

11 月 26 日，**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的上千学生为反对官方指责学习藏语无用，展开示威游行，遭军警镇压，其中很多人严重受伤被送医，同时青海省同仁县两青年僧人在自焚事件后被当局拘捕。另外，25、26 日青海、甘肃和四川又发生 3 起自焚事件。

新闻：http://fmn.cc/SmPAHX

http://fmn.cc/SmQiom



日本大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矢崎总业公司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工厂，约 250 名员工自 22 日起举行了罢工。中国媒体则称罢工的行动已经持续一周。不过据悉生产线已经基本恢复，对于传言外籍管理人员殴打女工，汕头市政府 22 日下午就表示是不属实的。

新闻：http://fmn.cc/UYU3zz

今年 7 月，**深圳**一名民警制造假案，并射杀一人，有关事件真相众说纷纭。据悉，民警李某可能与被杀者因谎报案情而存在矛盾，于是指使一名女子在案发地点谎称遭到抢劫，李某编造谎言将被害人载到现场并开枪将其杀害。

新闻：http://fmn.cc/V4m2eY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宿亮：大学是个什么玩意

新学期开始，又一批学生走进大学。与笔者十年前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相比，现在的大学楼更高、园子更大。记得数夜前参加学术会议，一学者戏称希望研究”大学学”，当时以为笑谈。但现在想来，确实应当弄清楚大学究竟是什么。

美国学者、哈佛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前主任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著作《大学的兴起》以历史的眼光分析了大学的”前世今生”。

哈斯金斯认定，没有人”发明”了大学。牛津大学与英国国王阿尔弗烈德没有关系，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也不能吹嘘自己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查理曼大帝也和巴黎大学的建立没有半毛钱关系。不是先有了大学才有教师与学生，而恰恰相反，有了教师和学生的聚集，才自然而然产生了大学。

最初的大学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建筑，或是堂而皇之的学位授予仪式。大学所拥有的无非是一套按照需要制定的制度和它所服务的人。

这个世界上最初有两种大学，一种叫做学生大学；另一种叫做教师大学。

所谓学生大学，指的是在某地求学的学生随着人数的增多，逐步产生了保护自己权益的需要。这些学生们组成了行会性质的组织，与那些出租给他们房子的市民作斗争，要求”包租婆”们满足学生的基本需要。之后，他们与教师作斗争，要求教师保证教学时间和教学质量。 学生大学的整套规定对教师上课、下课，甚至讲课的方法都有了明确的要求。由学生制定的严密规章决定教师能够给予与学费相当的授课。

所谓教师大学，是与学生行会相对而言，教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组成的行会性质的组织。这些教师聚在一起，为的是保证”教师队伍”具备行业竞争力。他们制定一系列资格条件，以考试决定新人能否加入教师行列。这种类似的许可证考试实质上就是最早形式的学位。许多学生结束学业后会参加这个考试，获得教师资格，但并不一定愿意做教师，这样慢慢演化出现在的学位考试和论文。



当年接受过苏格拉底教诲的学生肯定不会想到搞一纸证书，而钱钟书笔下不学无术的方鸿渐却愿意花钱去买美国”野鸡大学”的假文凭。就大学本身而言，学位就是个能力的证明，而非横行社会的”万灵丹”，自古如此。

最初的大学，学生发言权高的就成了学生大学，比如意大利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教师发言权高的就成了教师大学，比如巴黎大学。

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它本身是教育市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保证能够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学要履行自己一系列的职能。比如要求教师”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学位申请人、为学生提供准确廉价的教材、赋予教师充分学术自由等等。

眼下，许多中国人向往欧洲、美国的高等学府，幻想抱着书在剑桥叹息桥流连、在哈佛 Sever Hall 红砖房子里学习上初级语言课程等等，但殊不知，大学的魅力并不在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而是蕴含在创立的制度中，蕴含在学生与教师最初的简单敬业关系里。

中国大学在学习西方大学，努力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然而，仅仅是“大师、大楼、大气”并不能涵盖西方大学制度最为精华的部分；而行政性的大学管理方式激起的种种弊端也不是大学这种东西出现时的本质特征。看来真应该有人像哈斯金斯一样，研究”大学学”，弄清楚大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参考文献】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出版（王建妮译）

【返回目录】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路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目前已举办二十余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卢思骋、贺卫方、胡泳、黄耀明、秦晖、欧宁、潘毅、许宝强、叶荫聪、于建嵘、张铁志、周保松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路。今年 7 月，Co-China 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两岸四地大学生夏令营，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柏蔚林、冯自强

校订：舒欣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周梦蕾,陈楚君

技术支持：毛向辉、冯自强

出品人：杜婷

版权声明：1510 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

